

权威专家，绝版经典

- 是谁在孤独地激扬自己的人生
- 影响千年中国人思想的儒之先贤们
- 越过千山万水，憧憬岁月
- 我们在一起

马勇著

董仲舒

评传

传世大儒系列

传世大儒系列

董仲舒

评传

权威专家，绝版经典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仲舒评传/马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1

(传世大儒系列)

ISBN 978-7-5087-2891-9

I. ①董… II. ①马… III. ①董仲舒(前 179 ~ 前 104)
—评传 IV. ①B23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241 号

丛 书 名: 传世大儒系列

书 名: 董仲舒评传

著 者: 马 勇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35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第一讲 模糊的少年时代与家庭 / 001

家庭 / 002

师承 / 003

第二讲 儒术独尊：初登政治舞台 / 007

缙绅先生何以往归陈王 / 008

马上治天下 / 014

清静无为与有为 / 017

诸子的复出 / 021

景武之际的社会问题 / 026

仲尼之道的变异 / 028

长沙一去古今怜 / 032

独尊儒术：帝国安宁之道 / 035

第三讲 说言访对，为世纯儒 / 043

大道之要 / 044

帝王之道 / 049

天人之应 / 052

第四讲 帝国的梦想 / 057

“齐一天下”的可能 / 058

“小中央”与“众封建” / 067

第五讲 究天人之际 / 075

天人是否能感应 / 076

天 = 上帝 = 自然界 / 080

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 / 083

人，超然异于群生 / 086

王者，民之所往 / 089

援天道以证人事 / 093

第六讲 通古今之变 / 095

《春秋》在汉代以前的基本情况 / 096

《公羊》学在汉代异军突起 / 118

《公羊》学与阴阳五行合流 / 121

“《春秋》重人” / 125

辨物之理以正其名 / 131

奉天而法古 / 135

《春秋》决狱 / 140

《春秋》之义 / 144

第七讲 构造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模式 / 155

传统政治的基本出发点 / 156

正人先正己：君主专制的前提 / 160

德教：传统政治的基本原则 / 168

任贤任能：传统政治的组织路线 / 173

正名：传统政治的手段 / 176

更化与复归：传统社会的运转规律 / 179

第八讲 白衣三公与相国悲剧 / 189

白衣三公 / 190

思想家与政治家 / 193

两相骄王 / 198



第九讲 一代儒宗与万世师表 / 203

蛰居著述 / 204

后学的分化 / 206

万世师表 / 211

第十讲 正统思想家的历史定位 / 219

第一讲 模糊的 少年时代与家庭

——
董仲舒评传

传世大儒

董仲舒是秦汉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既是秦汉之前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总结，又是秦汉社会开辟新时代的思想独创。

也就是说，董仲舒的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过汉代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此后二千年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他之后直至辛亥革命发生时的两千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走向不能说完全按照董仲舒的设计而发展，但受其深刻影响则是学者不争的事实。

家庭

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订，对于理解董仲舒的思想与学术并无太大关系。他那短促的一生除两度匆忙地在政治舞台略微亮相之外，似乎一直在宁静的乡间过着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虽然对人生、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进行过深湛的思考，但似乎又对自己周围最应该熟悉的环境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冷漠；他贡献出值得人们再三玩味的宝贵思想，而自己却过着单调、乏味的平凡生活。

董仲舒，字宽夫^①，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②。西汉广川

① 《史记》、《汉书》均无董仲舒的字，只是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的《故城县志》始云董仲舒字宽夫。不知何据。详见周桂钿《董学探微》附录《董子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关于董仲舒的生年，《史记》、《汉书》均未提及，此据苏舆《董子年表》，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董仲舒生年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除了苏舆的说法外，尚有其他不同的说法。今人施之勉《董子年表订误》（《东方杂志》41卷24期，1945年）则以为董仲舒的生年应在孝惠高后时，具体何年则不知。但其年表的始年仍循苏舆的说法，定为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今人韦政通编著的《董仲舒年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依据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所附《董子年表》、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李威熊的《董仲舒与西汉学术》所附《西汉学术思想发展一览表》、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以及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所附《中国经学年表》等数十种文献，上及刘邦称帝，但仍如实表示董仲舒的生年并不详。唯周桂钿《董子探微》第一章《董仲舒考》及其所附《董子年谱考略》，详尽征引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论证董仲舒的生年在汉高帝九年，即公元前198年。与苏舆公元前179年的说法相差几20年，似乎不太可信。

董故庄（今河北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①。其生平事迹大概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董仲舒传》等极为有限的资料。

董仲舒生于文景盛世时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村家庭，关于他父母、祖上等家庭详细情况已不甚可考，能够知道的是他家“田连阡陌，牛马成群”，且拥有大批藏书。其家庭境况大概相当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耕读之家”。

师承

在董仲舒出生之前，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诸侯封建割据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得以确立和逐步巩固，在黄老政治与民休息无为思想指导下，人民得离战国诸侯相争、楚汉诸强相互残杀之苦，一个经济上渐渐由复苏到繁荣，政治上由分裂到统一的局面正在慢慢形成。

政治局面的稳定，经济生活的繁荣，使汉王朝于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痛下决心废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诗书的禁令。时距董仲舒出生12年。这一禁令的废除，使得儒家经传、诸子杂说纷纷重现。加上汉王朝从建国伊始就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诏郡国访求贤才；文帝即位之初（前179年）要求地方政府选贤举能——这一年正是董仲舒的出生之年。所有这些都诱使当时的富家子弟又埋首经典，追逐于仕禄之途。

董仲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早年如同一切富家子一样，为追求功名富贵而发愤求学。

据比较可靠的传说，董仲舒在其青少年时代，即已博览先秦诸子，除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外，对传世儒家经典诸如《周易》、《诗》、《书》等均有深湛而独特的见识与研究^②。其学习精神十分刻苦，“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

^① 此据周桂钿《董子探微》。《史记》只说董仲舒是“广川人”。而这个“广川”究竟指何地，历史上则有不同的说法，如德州、枣强、景州三处，其郡名皆曰“广川”。而这不同的“广川”在历史上也都分别以不同形式纪念董仲舒。如德州，学官有董子读书台，城西有广川桥。枣强有董仲舒的石像。景县则有广川镇，故城县有董学村，并有董子祠。这些混乱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迁。光绪十年所修的《畿辅通志》卷161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夫德州之曰广川，以晋武时改广川为长河，移属平原故也；枣强之曰广川，以汉景时分广川为枣强，后复并枣强入广川故也；景州之曰广川，以广川来属故也。”至于董仲舒的出生地董家庄，在汉为广川县地，时未置枣强，也不存在和平原等地的隶属关系，故而司马迁只说董仲舒为广川人。而这个广川，就是今河北衡水地区景县大董故庄。

^② 《汉书·韩婴传》说仲舒曾与精通《诗》、《易》的韩婴“论于上前”。

经传”^①。董仲舒的这种劲头一直保持到晚年，“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②。对学问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关于董仲舒的师承渊源，司马迁、班固都没有明说而隐约其辞，这大概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事。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时代的人，少年时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太史公自序》等篇中“余闻董生曰”，便被学者认为是引述乃师董仲舒的话^③。

司马迁既为仲舒弟子^④，其隐约其辞地描述乃师董仲舒的师承渊源线索应该大体可信。在《史记·儒林传》中，我们可以寻绎出董仲舒《公羊》学的师承脉络。简单地说，公羊高为子夏弟子，四传而至公羊寿，当汉景帝时始与胡毋生著于竹帛。其时，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公羊春秋》，而齐之言《春秋》者又多受于胡毋生。胡与董均以《公羊》名家，且同为景帝时博士。

《汉书·儒林传》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似乎二人仅为同事关系。然徐彦《公羊解诂叙疏》则明说董仲舒为胡毋生弟子。当然，不管他们二人是否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胡对董有一定的影响既为两汉学者公认的事实，那么我们也便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

胡毋生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今不可见，而董仲舒关于《公羊》学的著作则有《春秋繁露》。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现代著名学者吴承仕推测说：“何休所隐括使就绳墨者，实略依胡毋生条例，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阙之义盖本之胡毋生，而寻求归趣，往往与《繁露》相参。窃意董、胡创通大义，科旨之条已有伦脊，后师转有附益，至《春秋公羊文溢例》之伦作而集其大成，此约略可知也。”^⑤ 吴氏之说颇有见地，盖董仲舒勤于笔耕，将胡毋生见解融会贯通，故后人再也难以寻找到胡毋生的著作了。

也人指出：“胡、董两家家法自别，亦犹齐《诗》、鲁《诗》、韩《诗》之类耳。”徐彦称董为胡毋生的弟子，与《史记》、《汉书》的权威说法皆不合，由此可知徐说之误。胡、董既非一家，其《春秋》之传宜各有书。何以戴宏、何休只言胡毋生著于竹帛而不提及董仲舒呢？曰：“休固承胡毋氏之传，其详于本师，宜也。戴宏之师承虽不可考，要其推尊子都，谓其确得子夏之学，则亦承子都之传

① 《太平御览》840引。

② 桓谭：《新论·本造》。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服虔曰。

④ 但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并不尊奉董仲舒。参见张维华《汉史论集》，15页，齐鲁书社1980年。

⑤ 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118页，中华书局1984年。

者，故亦独详本师耳。”^①要言之，即使董仲舒与胡毋生没有师生关系，但胡对董的影响——至少在《春秋公羊》学方面还是十分明显的。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似乎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大凡名声显赫的学者差不多师承都不甚明了。因此，我们无需也似乎不太可能详细考证清楚董仲舒的师承渊源。

不过，我们知道，由于董仲舒学品兼优，名声日隆，在汉景帝时便成了博士。这时的博士虽然没有什么优厚的待遇，但它毕竟是知识富有的象征。只是由于此时最高统治者仍然醉心于黄老政治，对儒家学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董仲舒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大概只是教书、著述，弘扬儒学而已^②。

① 徐哲东：《公羊榘论·胡董第二》。

② 《汉书·董仲舒传》：“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然苏舆《董子年表》认为：“下帷为修学时事，传序于为博士下，盖追溯之。”

传世大儒
——董仲舒评传

第二讲 儒术独尊： 初登政治舞台



要真正理解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在于详尽地考证其出身、家庭及其政治活动，而是应当将其政治活动、思想贡献放到当时西汉社会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历史长河这种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否则，不足以明了其思想的内在价值和久远意义。

在当时西汉早期社会文化背景中，一个最突出的事件，就是非儒学派被法律所摒弃，儒家学说由诸子之一上升到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就是董仲舒的历史性功绩，也是其学术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所作贡献的真正价值。更是董仲舒由此登上西汉政治舞台、主导西汉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转折点，当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转折点。

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观点看，儒家地位的上升，规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在董仲舒之后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儒家学说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也发生过多少次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根本性变革，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也有过某些升降、变动，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儒家学说的绝对地位则一直维持不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儒家学说走上独尊这一转折过程，研究董仲舒在这一转折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不仅有助于理解董仲舒的思想，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

循神先生何以往归陈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①，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先后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共同向往和共同追求。自从周王室式微，特别是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称雄割据，人民深受战争动乱之苦，迫切要求重建统一的国家，以便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生活环

^① 贾谊：《过秦论》。



境。秦朝的统一战争迎合了人们的这一想法，“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①。因此，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广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军事的统一迅速得以实现，但如何巩固这一军事上的统一，就已不是单靠军事的力量所能完全解决得了的。秦王朝的统治者们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秦王朝在依靠军事上的实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的同时，便着手进行全国的法令、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工作，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期将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风俗各异的国家置于皇帝一人的统治之下，并以期建立千古一系的不朽伟业。这便不得不涉及到政治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等相关联的问题。

相对说来，政治的统一为文化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文化方面的某些制度、设施完全可能因政治势力的干预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文化的运动毕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运动，它的某些方面，诸如人们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深层结构，往往并不因政治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化。事实上，秦帝国的建立毕竟是仅仅依靠武力的征服，其政治上的变动过速过剧，也不可否认超越了人们心理上的实际承受能力。因此，当秦王朝积极从事文化方面的变革与统一时，博士淳于越便明确表示反对，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②。期望秦王朝决策者在制定文化政策时，充分考虑和尊重已有的文化传统，在保持社会秩序持久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变革。

然而，秦王朝的建立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已有的成功使统治者相信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是可以依靠强权加以征服的。于是，当有人提出尊重历史传统在刚刚征服的边远地区立诸侯以卫社稷时，“群臣皆以为然”，独重臣李斯持有异议。李斯认为，“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③。这就将原本正确的理论推向极端，以为在帝国内部，不仅政治、经济要统一，文化要统一，而且包括人们的意识、思想都应该统一在帝国的根本原则下。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想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百家争鸣最为激烈的战国时代，各个学派之间相互攻击辩难，除了探讨真知的目的外，显然都期望以己之道以易天下，将自己的学说作为统一的纲领。孟子的所谓“定于一”^④，荀子的所谓

① 《汉书·严安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孟子·梁惠王上》。



“法后王，一制度”^①，韩非的所谓“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②，以及庄子对“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抱怨^③，在在都蕴含着先秦诸子对思想统一、意志统一的渴望与追求，只是鉴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得以实现而已。

秦王朝统一帝国的建立，为文化上、思想意识上的统一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统一帝国能否真的成为万世一系的盛事伟业，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实有赖于能否使全体社会公众建立共识，具有统一的意思和统一的思想。在帝国最高统治者看来，如果天下有“异意”，允许人们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那就有可能导致帝国的崩溃与瓦解。因此帝国统治者真诚信奉的“安宁之术”，就是被李斯一语破的的所谓“天下无异意”的统治信条，就是尽一切可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他们相信，“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④。

秦王朝统治者的这一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说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任何社会如欲求得持续性的稳定与发展，无疑都有赖于社会成员共识的确立。问题在于，这种共识的确立必须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必须充分考虑到已有的文化传统。因为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或可以武力废除的外在形式，而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庞大国度里，不论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实力有多么强大，只要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任何文化统一的愿望总要落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实际结果与文化统一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帝国文化政策的正确选择，似乎应该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不可能根本动摇、推翻帝国的前提下，允许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的灵活的言论自由，从而使知识分子所惯有的怨气、不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这样或许较文化专制主义更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固。

然而，秦王朝的统一成就毕竟来得太快，使统治者无法从容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方略。固有的思维定势使他们觉得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于是便采取强硬的思想管制政策，于是便有焚书、坑儒两大虐政的发生。

① 《荀子·非十二子》。

② 《韩非子·扬权》。

③ 《庄子·天下篇》。

④ 《吕氏春秋·执一》。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从现有的资料看，起因和结局似乎并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是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70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虽说略嫌过头，但也有某些事实根据的颂扬话。

这些话，作为“颂词”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博士淳于越听了之后却大不以为然。他当面反驳道：“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俨然以为秦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而应该是在旧有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存旧图新，进行渐进的变革，充分利用旧有的文化资源以及旧有的传统和手段。

淳于越的话确实具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或者说复古主义的倾向，但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恰恰相反，淳于越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他不顾自身安危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是明明白白的“第二种忠诚”。作为最高统治者面对这种忠告应该抱有冷静的态度，从善如流，择善而从。

对淳于越的意见，秦始皇并没有怎样责怪。倒是丞相李斯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将问题推向极端。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相反也，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李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① 这就是焚书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李斯的理论就其前提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具有进化、变化的思想倾向。但其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